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新旧交替下的动荡与重塑^[1]

牛新春

【内容提要】多年来，巴以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一直被视为“茶壶里的风暴”，其影响相对有限。然而，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加沙冲突却迅速升级，扩大为涉及“七条战线”的大范围战争。其不仅波及整个中东地区，更具有全球性意义，甚至还渗透到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引发广泛而深远的连锁反应，昭示着中东权力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转换。在全球层面，俄罗斯影响力被削弱，美国相对影响力上升。在地区层面，伊朗及抵抗轴心遭受沉重打击，以色列、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扩大。在国内层面，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以色列、伊朗、黎巴嫩等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化。新旧权力格局转换往往伴随着动荡与冲突，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同时出现权力失衡，彼此交叉影响，中东形势持续紧张在所难免。

【关键词】加沙冲突 中东格局 地区安全 代理人战争 抵抗轴心 美俄博弈

【作者简介】牛新春，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1-0122-26

[1]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往史研究”（项目编号：23AZD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国际格局的转换往往是缓慢而渐进式的，但是战争与革命却能在短时期内打破旧格局，催生新格局。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球格局，而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则重塑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

近20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历次冲突曾被视为“茶壶里的风暴”（a tempest in a teapot），其影响相对有限。然而，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加沙冲突却迅速升级，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与伊朗互相袭击对方本土、红海危机及叙利亚政权更迭等，这些事件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东权力格局在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上的失衡。在国际层面，俄罗斯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而美国的影响力则有所上升，美以军事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在地区层面，伊朗及抵抗轴心^[1]遭受重创，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则显著扩大。在国家层面，叙利亚政权的更迭，以及以色列、伊朗、黎巴嫩和也门等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全力以赴支持以色列的激进政策，甚至提出“接管加沙”计划，恢复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给地区形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新旧权力格局转换往往伴随着动荡与冲突，未来一个时期，中东地区将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过渡期。

一、美俄影响力此起彼伏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帝国必争必霸之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对中东的影响力最为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霸中东，形成了所谓的“中东小冷战”。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而俄罗斯的影响力则逐渐式微。在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大国直接军事干预发展中国家的事件很少，但中东地

[1] 指由伊朗主导或支持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力量，包括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这些力量在中东地区共同对抗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

区却成为例外，遭受了频繁的外部军事干预。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在中东发动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分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均在中东设有军事基地，这也使得中东成为全球军事力量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在中东驻军的国家。

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标志着其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这一转变推动中东地区从美国独霸的局面逐渐向多极化格局演变。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对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其影响力已不再具有排他性和全方位的特征。特别是在经济领域，2023年欧盟与中东的贸易额为4543亿欧元，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达到4774.4亿美元，而美国仅为1600多亿美元。2024年，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通过贸易、投资、军售和驻军四个指标来对各大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进行评估。其报告显示，美国凭借其军事基地、安全保证、外交和文化作用，依然拥有最强大的综合影响力。中国则因与中东紧密的贸易、技术、经济和外交关系而紧随美国之后。俄罗斯虽在整体上远逊于美国和中国，但是在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等个别国家影响突出。^[1]简言之，美国在综合影响力上领先，但在经济领域，中国和欧洲已超越美国；俄罗斯在特定国家的军事影响力则对美国构成挑战。

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中东的上升得益于美国的战略收缩，特别是2015年俄罗斯借叙利亚内战军事上介入叙利亚，同叙当时的阿萨德政府结盟，从而在中东站稳了脚跟。叙利亚因其战略位置被称为“中东的心脏”，自2012年以来，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叙利亚内战。俄罗斯以叙利亚为支点，调动了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拉克等中东大国的关系，首次在冷战结束后重返中东政治舞台的中心。这是1990年以来美俄在中东影响力变化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此后的十年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经历了从巅峰到挫折的转变。

[1] Amr Hamzawy,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rms, Power Projection, and Nuclear Diplomac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4, <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MEP-Great%20Powers-2024.pdf>.

2016年，在俄罗斯、伊朗的支持下，本已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府转守为攻，收复失地，稳住了政权，从而使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作为回报，俄罗斯获得了包括第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在内的新军事设施。更为重要的是，2017年俄罗斯与叙利亚签署了为期49年的塔尔图斯港租约，俄海军自1970年起就在此开展军事活动。在俄罗斯的主导下，相关各方通过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并最终于2019年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叙利亚局势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僵持状态。然而，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无暇他顾，撤走了部署在叙利亚的部分军队。2024年底，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沙姆解放组织”（HTS）仅用12天就推翻了阿萨德政权。期间，俄罗斯并未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援助，阿萨德本人也不得不远赴俄罗斯寻求庇护。

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因2024年地区形势的剧变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实际上，俄罗斯的战略目标相对明确，主要聚焦于保护叙利亚等仅存盟友的安全，并策应伊朗等反美力量，以干扰和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进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这些目标相辅相成，没有盟友的支持，俄罗斯就没有挑战美国的支点。然而，2024年中东形势的剧变使其战略处境变得异常困难。一方面，伊朗支持下的抵抗轴心遭受以色列的沉重打击，导致地区主要反美力量陷入低潮，俄罗斯失去了同美国周旋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使俄罗斯失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可能退回到2015年之前的状态，过去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随着叙利亚政权的更迭，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布局面临重大调整，其军事基地的未来成为关键议题。目前，俄罗斯已经撤出除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两个军事基地之外的所有军事设施和人员，驻防塔尔图斯港的潜艇也已全部撤离。叙利亚过渡政府尚未公开要求俄罗斯撤出军事基地，而是表示愿意同俄罗斯进行谈判，但鉴于俄罗斯过去10年一直支持叙利亚政府打击“沙姆解放组织”，该组织敌视俄罗斯亦在情理之中。因此，即便俄罗斯

能保住军事基地，但在缺乏叙利亚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基地的作用将大为受限。但如果双方谈判破裂、俄罗斯最终失去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其影响将是全球性的。失去前者将大幅削弱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作战能力，减少其军事行动的范围和频率。囿于缺少补给和休整基地，俄罗斯舰艇的部署时间将大为缩短，频繁的长途航行会增加舰艇磨损和运营成本，使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活动变得短暂、昂贵且零星，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找到替代基地。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丧失，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一个重大打击，该基地一直是俄方空中力量投送的重要枢纽。英国前驻俄罗斯国防武官约翰·福尔曼（John Forrest）强调，赫梅米姆基地“完美地”位于俄罗斯与非洲之间，使俄罗斯能够向利比亚、苏丹、中非和马里等地区运送部队。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高级研究员萨宾·费舍尔（Sabine Fischer）指出，普京的战略愿景是使俄罗斯在多极化、后西方世界中成为全球性玩家，而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不啻于对其梦想的沉重一击。^[1]

将叙利亚战后重建问题与俄罗斯在叙的军事存在相捆绑，已成为相关各方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激烈博弈的筹码。目前，叙利亚过渡政府正急切地寻求解除国际经济制裁，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和重建。而美欧则想借此天赐良机，将俄罗斯的影响彻底清除出叙利亚，因此将俄军事基地的撤离设定为解除制裁的先决条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强调，许多欧盟国家的外交部长都认为，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是叙利亚新政府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2]在俄罗斯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初步接触中，俄罗斯表示愿意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保住其两个军事基地。然而，叙利亚新领导人明确表示，这些还远远不够，俄罗斯必须先承认新政府，恢复同叙利亚的经济关系，迈出国际社会接纳叙利亚的第

[1] “Syrian rebels have dealt a blow to Vladimir Putin’s naval ambition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4/12/10/syrian-rebels-have-dealt-a-blow-to-vladimir-putins-naval-ambitions>.

[2] “Everyone wants to meet Syria’s new ruler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9,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4/12/19/everyone-wants-to-meet-syrias-new-rulers>.

一步。^[1] 俄叙之间经过几轮直接接触后，军事基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2024 年中东形势的变化却让美国的战略处境大大改善。在全球层面，俄罗斯因叙利亚的变局而影响力衰退；在地区层面，伊朗因抵抗轴心受挫而处境艰难；在国内层面，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伊朗均出现了权力结构的失衡，反美力量普遍受挫。总体而言，这些新变化对美国极为有利。美国中东研究所（MEI）研究员法迪·尼古拉斯·纳萨尔（Fadi Nicholas Nassar）指出，“这是华盛顿决策者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局面，如今竟成为了现实”。^[2]

尽管拜登政府原本有意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但实际情况却是美国大大增加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活动。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布局早已根深蒂固，拥有至少 19 个军事设施，其中 8 个为永久性基地，分布在巴林、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沙特、叙利亚和阿联酋等国家。^[3] 在本轮加沙冲突中，美国不甘于置身事外，不仅间接参与，还直接介入了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数度增派战斗机中队和海军舰艇编队。通常情况下，美国在中东的驻军规模为 3.4 万人，但到 2024 年 10 月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4.3 万人，其中多数增派部队来自海军。当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部署到中东时，美军总人数可达 5 万人，而这种情况在 2024 年并不罕见。2024 年 2 月，美军为显示其战斗力，派遣两架 B-1 轰炸机从德克萨斯戴斯空军基地起飞，往返飞行 30 多个小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 85 个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目标进行了打击。同年 4 月和 10 月，

[1] “The secret talks between Syria’s new leaders and the Kremlin,”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4/12/16/the-secret-talks-between-syrias-new-leaders-and-the-kremlin>.

[2] Fadi Nicholas Nassar, “Under Donald Trump, Washington can decisively defeat Hezbollah,” December 17, 2024, <https://www.mei.edu/blog/four-years-tectonic-shifts-redrew-middle-east>.

[3] Jonathan Masters and Will Merrow, “U.S. Troops in the Middle East: Mapping the Military Prese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1, 2024, <https://www.cfr.org/article/us-troops-middle-east-mapping-military-presence>.

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袭击时，美军组织并直接参与了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拦截行动。12月，美国部署在以色列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首次参与对胡塞武装发射导弹的拦截。以色列前防空指挥官兹维卡·海莫维奇(Zvika Haimovitch)指出，在此次行动中美国军队服从以色列的指挥，这一举动非同寻常，因为美军通常只服从本国指挥。^[1]由此可见，尽管以色列与美国在过去一年中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但双方在情报和军事合作方面的紧密程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态势大概率会在战后继续维持。

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及其军事实力的展示，引发阿拉伯国家重新评估其安全政策，促使部分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寻求更紧密的防务关系。加沙冲突前，美国在中东大搞战略收缩，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弱化对地区国家的安全承诺，导致阿拉伯国家纷纷同美国拉开距离，寻求对外政策的多元化。然而，美国在加沙冲突中所展现的强大军事和情报实力，激发了阿拉伯国家重新加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的意愿。巴林作为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在国，于2023年9月与美国签订了“全面安全一体化与繁荣协定”，并在同年12月成为唯一公开参加美国在红海“繁荣卫士行动”(RSGO)的穆斯林国家。2024年9月，在协议签署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巴林驻美国大使阿卜杜拉·本·拉希德·阿勒哈利法(Abdulla bin Rashid Al Khalifa)表示，巴林希望将该协议从“行政协议”升级为“正式条约”，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以构建地区性防务体系。^[2]同月，阿联酋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正式升级为美国的“主要防务伙伴”，成为全球第二个获此地位的国家。此外，沙特也正在与美国进行积极磋商，以签署一项具有条约性质的新防务协议。

[1] Emanuel Fabian, "In first, US THAAD system deployed in Israel assists in Houthi missile interception,"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28,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n-first-us-thaad-system-deployed-in-israel-assists-in-houthi-missile-interception/>.

[2] Steven C. Bondy, Sheikh Abdulla bin Rashid Al Khalifa, "U.S.-Bahrain Ties One Year After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 Watch 3928, September 11, 2024,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us-bahrain-ties-one-year-after-strategic-partnership-agreement>.

加沙冲突在重塑中东安全格局的同时，还意外地促进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防务合作，为美国在该地区推进海空一体化防御体系提供了契机。2024年4月，伊朗与以色列互相攻击对方本土，这一事件促使一些阿拉伯国家首次低调地与美国、以色列展开防空合作。美国在合作中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成功拦截了99%的飞行物，极大提振了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信心和积极性。多年来，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中东防空联盟的建立，但一直进展缓慢，然而此次合作的成功为防空联盟的建立带来了新的转机。2024年5月21日，科威特与美国签署了雷达数据共享协议，而其他海湾国家也极有可能跟进。该协议签订的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和海湾国家代表在利雅德召开年度防务会议，讨论将刚刚实践过的防空合作机制化，并计划将防空联盟扩展至海上，以打造海空一体化的防御体系。这一进展对美国而言是个意外的收获。而美国民众在过去一年中对美军的信任度也有所上升，2024年12月的民调显示，大约51%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军队非常有信心，比上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1年分别为48%和45%。^[1]

美俄实力地位的变化必然促使双方调整其政策，进而引发大国关系的重构。这将导致地区国家间关系的重新洗牌，尤其是那些原本亲俄、挺俄的国家会重新权衡自身的立场。但总体而言，中东政治多极化的进程被迟滞了。

二、地区权力格局重组

近20年来，随着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中东传统强国的衰落，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四个国家成为中东政治的主角。四国之间合纵连横，权力此消彼长，决定着地区格局的演变方向。而2023年爆发的加沙冲突恰似一场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直指“阿拉伯之春”后形成的中东新权力格局。

[1] John Goheen, “Survey: Public Confidence in U.S. Military Growing,”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ngaus.org/newsroom/survey-public-confidence-us-military-growing>.

（一）“阿拉伯之春”后一个时期中东权力格局——“什叶派新月”的崛起

伊朗迎来战略机遇期。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最初的十年间，伊朗主要致力于应对两伊战争的严峻挑战。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意外地给伊朗创造了首个战略机遇期，其两大竞争对手——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继被推翻，从而拓展了伊朗的地缘政治空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又为伊朗提供了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叙利亚内战期间，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和黎巴嫩真主党战斗人员直接介入，全力保卫阿萨德政权，使其在中东腹地的战略支点得以稳固。同时，在也门内战中，伊朗和真主党向胡塞武装输送了大量人员、技术和武器支援，助力其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当“伊斯兰国”在中东肆虐时，伊朗又大力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攻城掠地。在真主党的协助下，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杰哈德组织得以在黎巴嫩南部站稳脚跟并建立了分支机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各自国家中崛起为最具实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彼此连枝同气，遥相呼应，构建起一个强大的抵抗轴心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勾勒出所谓“什叶派新月”的清晰轮廓，标志着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攀升至近代以来的顶峰。美国中东问题专家高斯（F. Gregory Gause III）指出，“从权力政治角度看，伊朗无疑是过去十年中东动荡的最大赢家”。^[1]到2020年，伊朗具备了在整个中东地区投送力量的能力。2023年10月7日加沙冲突爆发后，抵抗轴心各支力量首次共同协同作战，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民兵、胡塞武装以及伊朗先后对以色列发起打击，以色列被困在“七条战线”^[2]之中，美国亦疲于应付，伊朗的影响力达到顶点。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始终巧妙地同抵抗轴心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灵活的策略使其能够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实现巨大的影响力。

土耳其“南下”意图受挫。自建国以来，土耳其一直渴望融入欧洲，

[1] F. Gregory Gause, III, “Ideologies, Alignments, and Underbalancing in 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July 2017, p.672.

[2] 分别是加沙、约旦河西岸、叙利亚、也门、黎巴嫩、伊拉克、伊朗。

将中东视为落后、动荡之地。然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在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的引领下，土耳其的战略重心悄然南移，积极向伊斯兰世界靠拢，意图借助“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的影响力拓展其在中东的战略版图。^[1] 尽管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伊斯兰属性成为土耳其融入欧盟难以逾越的障碍，却成为其“南下”伊斯兰世界的捷径。“阿拉伯之春”初期，政治伊斯兰势力风起云涌，“土耳其模式”备受推崇。当时，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在埃及、突尼斯执政，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成为主要的反政府力量。以政治伊斯兰为意识形态基础，土耳其迅速卷入中东政治，这是自1923年建国以来土耳其首次大规模介入中东事务，成为中东政治的新玩家。然而，政治伊斯兰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土耳其首次亮相中东舞台就遭遇挫折。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际，土耳其积极支持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期望在叙利亚复制埃及模式，建立一个以“政治伊斯兰”为基础的政权。然而事与愿违，“政治伊斯兰”政权并未在叙利亚落地生根，土耳其却因为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几乎跟中东所有国家反目，与埃及、阿联酋、沙特、伊朗、约旦等国陷入敌对状态。更糟糕的是，叙利亚内战催生了“伊斯兰国”，美国为剿灭这一恐怖组织而选择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通过空投武器等方式强化库尔德人的军事组织“人民保护部队”（YPG）。然而，此举已触及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因为土方一直将“人民保护部队”视为恐怖组织。2015年，俄罗斯出兵支持叙利亚政府，土耳其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优势，土耳其不得不同俄罗斯妥协，任何重大军事行动都需要得到俄罗斯的默许。一时间，美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政府、“伊斯兰国”、库尔德武装六方势力皆是土耳其的对手，只有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是其合作伙伴，土耳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通过干预叙利亚内战，土耳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但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以色列虽有失亦有得。叙利亚内战削弱了阿萨德政权，以色列最初因此获益，但随着战事延宕及伊朗、真主党、 Hamas等势力在叙利亚的壮大，

[1] 用伊斯兰教指导、改造政治的运动被称为政治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是解决方案”是各个政治伊斯兰主义派别的共同点。

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反而受到威胁。但是，这一时期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以色列抓住这一契机，积极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2020年，以色列同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沙特阿拉伯的建交事宜也在积极商讨之中，并与埃及在西奈半岛开展了联合军事行动。此外，以色列充分发挥其军事优势，对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并在伊朗境内搞定点清除行动。因此，尽管面临诸多安全挑战，以色列却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巩固了其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色列在中东地缘政治的棋局中，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沙特陷入四面楚歌。同其他三个大国相比，沙特的处境显得尤为艰难。“阿拉伯之春”后，沙特不仅要警惕政治伊斯兰，还要应对来自伊朗、土耳其的压力，这些力量均被视为对其王权合法性的潜在威胁。沙特王储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曾将土耳其、伊朗和“政治伊斯兰”并称为“邪恶三角”。^[1] 沙特四面出击，多方树敌，想靠一己之力逆转“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地区格局变化。为反制伊朗，沙特于2012年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并对叙利亚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2015年，沙特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出兵也门，打击胡塞武装；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两国关系降至冰点；2017年，因卡塔尔支持政治伊斯兰，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全面封锁；2018年，为迫使黎巴嫩政府远离伊朗和真主党，沙特扣押黎巴嫩总理哈里里（Rafik Hariri）；同年，因沙特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暗杀事件，沙特与土耳其接近断交边缘。此外，沙特还因人权问题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关系紧张。一时之间，沙特面临四面受敌的艰难困境，其激进的外交政策引发诸多国际争议和挑战。

[1] Jana J. Jabbour, "After a Divorce, a Frosty Entente: Turkey's Rapprochement with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audi Arabia," Th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2,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migrated_files/documents/atoms/files/2jabbour_turkey_sa_uae_mai2022.pdf.

（二）2023 年加沙冲突——中东新权力格局的压力测试

历经“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十年动荡后，中东各主要国家从 2020 年起逐渐步入政策回调期，政治和军事斗争出现缓和迹象。2020 年 9 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为阿以关系的缓和拉开序幕。2021 年 1 月，卡塔尔埃米尔应邀访问沙特，标志着自 2017 年断交以来，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得以修复。2022 年 8 月，土耳其与以色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2023 年 4 月，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宣布复交。至此，主要大国间的关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意味着相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新的权力格局，尤其是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不得不接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影响力扩大的现实。然而，2023 年爆发的加沙冲突犹如一场猛烈的风暴，成为对中东新权力格局的压力测试。战争结果无情地证明，伊朗影响力虚高，难以经受住实战的考验；以色列和土耳其凭借战争的洗礼，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沙特则吸取“阿拉伯之春”中冒进的教训，选择保持低调，专注于经济发展，极力避免被卷入冲突，从而使其实际影响力在相对平静中稳步上升。

伊朗的“代理人战争”策略失灵，抵抗轴心土崩瓦解。一直以来，叙利亚和真主党是伊朗的左膀右臂，也是其“代理人”战略的重要支柱。近十年来，抵抗轴心成员之间能够实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得益于叙利亚作为陆地走廊的地利之便；而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紧密协作、遥相呼应的网络化组织，全靠真主党的穿针引线——尽管伊朗在抵抗轴心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真主党才是这根轴心的灵魂所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曾直言不讳地宣称，真主党才是轴心中的轴心。其领导人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更是取代了 2020 年被美军定点清除的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的位置，成为抵抗轴心的关键人物。^[1]然而，加沙冲突的爆发，使得抵抗轴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处

[1] Elliot Kaufman, “Benjamin Netanyahu: The Inside Story of Israel’s Victor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netanyahu-the-inside-story-of-israels-comeback-victory-middle-east-change-dad847d8>.

于土崩瓦解的边缘。战争不仅斩断了抵抗轴心的链条——哈马斯、真主党、叙利亚三个重要成员几近遭遇灭顶之灾，而且成员间的互信亦严重受损——当哈马斯和真主党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却没有等到伊朗的全力支援；2024年10月，伊朗试图集结抵抗轴心的力量，对以色列发起一场协调一致的集体报复行动，但最终却只能孤军奋战，独自面对强敌。

在与以色列的博弈中，伊朗自身实力也未能经受住考验。多年来，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试图将战争推进到以色列家门口，同时避免与以色列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2024年4月和10月伊以间的两轮军事交锋证明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已经失灵——伊朗意图对以色列造成沉重打击，以重新确立对以色列的威慑，但其努力并未奏效。曾在2024年4月参与拦截伊朗导弹行动的美军飞行员本杰明·科菲（Benjamin Koffi）指出，伊朗的袭击并非一次小规模武力展示，而是旨在造成重大破坏和杀戮的袭击。^[1]但是，在美、英、法及阿拉伯国家的支援下，以色列几乎完全挫败了伊朗的进攻。相反，以色列的精准空袭大大削弱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及导弹、无人机和核计划。2024年10月初，伊朗曾威胁要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袭击，但最终没有了下文，反而是以色列在12月底开始讨论对伊朗本土采取行动。显然，通过两轮面对面的军事较量后，以色列不仅成功建立了对伊朗的威慑，还暴露出伊朗及其抵抗轴心的脆弱性。

以色列依靠军事冒险主义重塑中东秩序。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是其军事冒险主义屡屡得手的结果。通过一系列主动出击，以色列不仅重塑了地区权力格局，更在悄然改写游戏规则，试图构建所谓的“中东新秩序”。经过一年多的军事行动，哈马斯、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大大降低，以安全环境大为改观，这一局面在一年前或许连以色列自身都不敢奢望。目前，以色列又有了“更宏伟的”战略规划。在加沙，尽管2025年1月19日以色列与哈马斯开始执行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追求永久性安

[1] Suzanne Maloney, “The Middle East’s Dangerous New Norma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israel-iran-dangerous-new-normal-suzanne-maloney>.

全控制，这意味着战争不会彻底结束，军队亦不会全部撤出。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持续扩大定居点建设，甚至不排除正式兼并定居点的可能性。在黎巴嫩，根据以色列与真主党于2024年11月27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后者应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不得在黎巴嫩南部活动。此外，以色列与美国私下达成的附加协议，进一步赋予其在认定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协议时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这实际上是为以色列未来对真主党的长期打击开了绿灯。在叙利亚，以色列不仅摧毁了其绝大多数战略武器，并占领了部分领土。以色列还发出警告，未来若发现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或军事活动，不仅会打击伊朗目标，而且会直接对叙利亚政府动手，这标志着新的游戏规则的确立。自2013年起，以色列开始打击叙利亚境内真主党的补给线；2017年，以色列又将军事行动扩展至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尽管以色列避免与叙利亚政府和伊朗的直接交火。2024年11月27日以黎停火后，以色列国防军曾迫使几架疑似向真主党运送武器的伊朗飞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领空掉头。^[1]2025年1月27日以黎停火协议到期后，在以色列要求下协议延期到2月18日，2月18日到期后以色列要求再次延期，暴露出其长期驻军的野心。这些同样是新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直言不讳地表示，以色列正在“改变中东”，“叙利亚已非昔日之叙利亚，黎巴嫩亦非往昔之黎巴嫩，加沙不再是从前的加沙，而引领抵抗轴心的伊朗亦已不复是过去的伊朗”。^[2]

土耳其在中东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以及“沙姆解放组织”上台执政，显著改善了土耳其在中东的战略环境。叙利亚内战以来，土耳其坚定地支持反政府武装，与阿萨德政府、伊朗和俄罗斯形

[1] “Iran eyeing air corridor to Hezbollah in place of Syria land route,”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23,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report-iran-eyeing-air-corridor-to-hezbollah-in-place-of-syria-land-route/.

[2] Lazar Berman, “PM discusses hostages with Trump as Israeli officials say deal could be clinched in days,”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15,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m-discusses-hostages-with-trump-as-israeli-officials-say-deal-could-be-clinched-in-days/>.

成对立。如今，这三大势力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已大幅减弱，为土耳其在该地区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空间。关于“沙姆解放组织”的性质虽然存在多种解读，但其政治伊斯兰属性恐怕是确定无疑的，这使其成为土耳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可靠伙伴。因此，土耳其是首个派遣外交部长、情报部长访问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国家，并在大马士革率先恢复大使馆业务，还承诺向“沙姆解放组织”提供军事援助。没有了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的阻拦，土耳其在打击库尔德武装方面的自由度和空间明显扩大。在“沙姆解放组织”占领大马士革的当天，土耳其就空袭了库尔德武装，土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也迅速占领了原先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曼比季。虽然土耳其与美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但是随着叙利亚政权的更迭及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未来美国同土耳其达成妥协、从叙利亚撤军的可能性大增。这将为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提供新的机遇。奥斯曼帝国解体100年后，土耳其终于在中东找到了两个重要的立足点，一个是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立足点，另一个是地理上的立足点——叙利亚。

沙特“坐享其成”。从2020年开始，沙特摒弃了以往四面出击的策略，转而奉行“零问题”外交，同伊朗、卡塔尔、加拿大复交，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永久停火，并主动接触哈马斯、真主党等势力，可谓中东“和解潮”的引领者。在本轮加沙冲突及其引发的连锁冲突中，沙特刻意保持低调，避免卷入其中，然而局势的发展似乎恰恰契合了沙特的利益诉求：沙特把结束加沙战争、推动巴勒斯坦建国作为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从而间接对战争进程施加影响；同时，沙特也同伊朗保持外交与军事层面的接触，间接保持对也门局势的影响；在巴勒斯坦，沙特历来支持法塔赫，哈马斯遭受重创正中沙特下怀；在黎巴嫩，沙特多年来支持逊尼派政党，真主党势力被削弱亦符合沙特利益；在叙利亚，沙特反对阿萨德政权，其政权更迭自然契合沙特的战略考量；在整个中东地区，伊朗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抵抗轴心的受挫无疑对沙特极为有利。对沙特而言，唯一的隐忧在于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的政治伊斯兰属性，因为这与沙特的意识

形态存在根本冲突。

（三）四大权力中心的角力之下，中东权力格局仍属未定之天

经过“阿拉伯之春”与加沙冲突两次大洗牌之后，中东地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权力重组，形成了四个相互对立的权力中心：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中心”、伊朗的“什叶派中心”、以色列的“西方中心”及沙特的“温和逊尼派中心”。其中，“什叶派中心”在这场地缘政治的博弈中遭受重创，而“西方中心”和“政治伊斯兰中心”将在新形成的权力真空中展开激烈的角逐。

以色列首次迎来成为地区大国的战略契机。以色列早已具备成为地区权力中心的硬实力，却因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长期联合封锁，其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展现，因而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大国。此次加沙冲突中，以色列虽在政治和道义上倍受地区国家的孤立，但其与阿拉伯国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却意外得到了强化。在安全领域，多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合作，共同拦截伊朗导弹。在经济上，2024年前9个月，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以色列与巴林的贸易额激增了10倍，与摩洛哥的贸易额增长了53%，与埃及的贸易额增长了52%，与阿联酋的贸易额增长了4%。^[1]黎以停火后，美国和以色列对黎巴嫩政府的影响明显扩大；叙利亚政权更迭后，“沙姆解放组织”表达了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意愿。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叙利亚一直对以色列持敌视态度，反以立场是其国家政治的重要特征。如今，这些长期坚持的教条受到质疑，新政府有望改变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从而终结1979年以来叙利亚与伊朗之间的反以联盟。未来，以色列同伊朗、土耳其的矛盾虽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但与此同时，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仍有改善的空间与前景。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主任阿夫纳·戈洛夫（Avner Golov）指出，“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以色列首次迎来成为地

[1] Mamdouh Al-Wali, "Israel continues to increase trade with Arab and Muslim world," Middle East Monitor,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41106-israel-continues-to-increase-trade-with-arab-and-muslim-world/>.

区大国的契机”。^[1]

土耳其推动“政治伊斯兰”的复兴。2013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被推翻，以及2014年突尼斯“复兴运动”失去执政地位后，“政治伊斯兰”运动一度陷入低潮，土耳其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然而，当前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土耳其、叙利亚、卡塔尔和阿富汗再度形成了“政治伊斯兰中心”，时间似乎又倒流回2012年。过去二十余年间，伊朗的“什叶派新月”一直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现在土耳其正在崛起，重塑了从非洲之角到黎凡特、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版图。^[2]若“沙姆解放组织”能在叙利亚站稳脚跟，土耳其的影响力就会进一步向外辐射。在非洲之角，土耳其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土耳其把索马里作为支点国家，借助政治伊斯兰的纽带，向索马里提供大量的人道主义、基础设施、医疗保健、教育和军事援助，目前已经成为对索马里影响最大的外部国家。2024年12月在土耳其的斡旋下，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达成和解协议，土耳其的影响进一步突显。^[3]

沙特继续奉行平衡外交。沙特作为“温和逊尼派中心”的主导力量，一直以来在中东地缘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外交行为向来谨慎，未来有望游走于其他三大权力中心之间，以寻求战略利益的最大化。“阿拉伯之春”初期，沙特联合阿联酋、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共同构筑了“温和逊尼派中心”，这一联盟本来是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伊斯兰中心”的回应。后来随着政治伊斯兰的式微，该中心也失去了针对的目标。如今，

[1] Dov Lieber, “Israelis See Chance to Remake Middle East in War’s Wak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6, 2024,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israel-regional-power-global-struggle-dfd9e694?mod=hp_lead_pos3.

[2] Hassan Hassan, “The balance of power is shifting in the Middle East – and it is Turkey’s ‘full moon’ on the rise,” *The Guardian*, December 19,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4/dec/19/balance-of-power-middle-east-turkey-ankara-syria-rebels-iran>.

[3] “Dynamics in the Horn of Africa reg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https://niss.gov.ua/en/doslidzhennya/mizhnarodni-vidnosini/dynamics-horn-africa-region-and-interests-republic-turkey>.

“政治伊斯兰”有卷土重来之势，这或许将重新激活“温和逊尼派中心”的活力。但是，沙特的外交策略并非简单的对抗，而是致力于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未来甚至可能将土耳其也纳入这一个平衡外交的格局之中。在叙利亚问题上，尽管沙特对“政治伊斯兰轴心”的崛起心存忧虑，但已主动与“沙特解放组织”展开接触，并率先向叙利亚提供了援助。在黎巴嫩，沙特曾因伊朗影响力的扩张而受挫，但如今形势再度转变，沙特正以旁观的姿态静待时机。尽管以色列和土耳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沙特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无论沙特最终如何抉择，其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或许都将超越埃尔多安和内塔尼亚胡。^[1]

沙特、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四大权力中心之间不仅存在权力之争，而且还带有浓厚的教派、意识形态竞争色彩。在宗教上，沙特坚守保守的瓦哈比教义，伊朗是什叶派，土耳其秉承温和的逊尼派理念，而以色列则以犹太教为国教，这些宗教歧见在历史上早已埋下恩怨的种子。在意识形态上，沙特实行王权政治，伊斯兰教服从并服务于王权，不参与国家政治；伊朗则是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公民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政党执政的民主国家，是伊斯兰民主的代表；以色列则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国家，其多党制和议会制特点使得国内政治格局相对复杂且充满竞争。权力之争与宗教、意识形态问题相互交织，让四大力量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政治伊斯兰与温和逊尼派在意识形态上互为竞争对手，两者均与以色列存在政治对立，同时又与伊朗在宗教层面形成竞争态势；以色列同伊朗之间的对立更是全方位的。可见，四方之间皆是宿敌，敌人之敌人亦难成友。

[1] Gideon Rachman, “Netanyahu and Erdoğan compete to be the Middle East’s strongman,”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6,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7cee48db-40bb-48c9-ac41-b771f6249444>.

三、多国内部权力失衡

内政与外交相互交织，往往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有时甚至陷入恶性循环。地区权力格局变化及相关国家的外交得失，不可避免地会传导到国内政治中，引发国内权力的失衡，进而导致革命或政权更迭；同时，国内政局的动荡又会反噬地区权力平衡，形成一种双向的恶性循环。叙利亚局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在地区权力博弈中失势，导致阿萨德政权失去了外部支持，最终引发政权的更迭；政权更迭不仅改变了叙利亚的国内政治格局，还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土耳其和以色列则借此机会实现了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跃升。叙利亚并非中东地区因国内权力失衡而陷入动荡的最后一个国家。事实上，该地区多个国家的国内权力平衡正因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而受到严重冲击。这种冲击不仅加剧了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动荡，这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最主要的根源。

（一）叙利亚之后，黎巴嫩正成为中东下一个风暴眼

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支持下，黎巴嫩的部分政治势力正试图利用当前局势对真主党发起挑战，甚至意图解除其武装。这一行动有可能引发黎巴嫩国内新一轮的动荡，甚至内战。经过长达14个月的战争，真主党已经严重被削弱。随着阿萨德政权被推翻，真主党又失去了叙利亚这一重要的支持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利亚曾长期控制黎巴嫩政府，甚至左右其总统、部长等重要职位的任命。2005年叙利亚军队被迫撤出黎巴嫩后，继续通过真主党对黎巴嫩施加影响。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真主党积极向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持，而“3·14联盟”^[1]（March 14 Alliance）则坚决反对，

[1] 黎巴嫩的一个政治联盟，其名称来源于2005年3月14日的大规模反叙利亚示威活动。该活动是为了纪念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身亡后的第29天，当时有超过一百万黎巴嫩人走上街头，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这一事件成为黎巴嫩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黎巴嫩因叙利亚问题而再次陷入分裂。《新阿拉伯报》分析指出，阿萨德政权的崩溃将从根本上重塑黎巴嫩的政治格局，一些势力将失去影响力，另一些势力则将从中获益。^[1]与此同时，伊朗与真主党之间的陆上走廊被切断，伊朗对真主党的援助也面临巨大障碍，伊朗是否有战略决心重新武装真主党，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法国和以色列正借机策动黎巴嫩国内政治转型，试图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在政治上将其边缘化。2025年1月9日，黎巴嫩议会投票选举出新总统和新总理，而真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全部落选，这标志着其国内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在黎巴嫩的教派分权制度下，总统必须是基督徒，总理是逊尼派穆斯林，议长是什叶派穆斯林，这种复杂的权力分配机制使得总统选举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自2022年以来，由于真主党的否决，议会曾12次投票都未能选出总统。而在本次选举中，美国、法国和沙特支持基督教马龙派、逊尼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政党组成的“3·14联盟”与部分什叶派议员达成妥协，最终选出了新总统，真主党因此被边缘化。美国国务院时任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希望看到黎巴嫩最终能够打破真主党对国家的控制，并取消真主党对总统选举的否决权。^[2]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重要资助者，过去20年累积提供超过25亿美元的援助，是其最大的单一捐助国。这种长期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不仅增强了其武装部队的实力，也使美国在黎巴嫩的政治和军事事务中拥有重要影响力。2024年11月27日，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达成停火协议，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这一重任自然落在了黎巴嫩武装部队身上，而美国作为其主要支持者，无疑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法瓦兹·格尔盖斯（Fawaz

[1] Rita El Jammal, “How the fall of Assad regime marks a new chapter for Lebanon,” *The New Arab*, December 9, 2024, <https://www.newarab.com/news/how-fall-assad-regime-marks-new-chapter-lebanon>.

[2] Mickael Crowley, “U.S. Aims to Revive Failed U.N. Plan for Lebanon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11/us/politics/us-diplomacy-israel-lebanon.html>.

A. Gerges)指出,以色列试图在什叶派与其他教派之间制造隔阂,而美国的这一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黎巴嫩已处于一场“毁灭性新内战”的边缘。^[1]

(二) 以色列右翼势力因战事得手而影响上升,国内政治格局进一步极化

2022年12月,内塔尼亚胡组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为右倾的六党执政联盟,并任命两个极右翼政党的领导人——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和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分别担任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2023年3月,内塔尼亚胡强推司法改革,却遭遇国内的强势反弹,右翼势力的气焰一度受挫。同年10月7日, Hamas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战略、情报和军事层面均出现重大失误,右翼声誉再次受损。然而,经过一年的冲突,以色列取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军事“胜利”,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得以巩固,右翼势力的影响也随之上升。随着冲突接近尾声,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斗争再次浮出水面。右翼人士要求重新启动司法改革,将最高法院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从而改变以色列的根本政治体制;呼吁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考虑兼并部分定居点,以扩大以色列的领土面积;主张永久占领加沙地区,让犹太人定居点重回加沙。这些激进的主张无疑将引发以色列国内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深刻改变和动荡。

(三) 哈马斯遭受重挫后,巴勒斯坦内部权力平衡被打破,权力斗争加剧

哈马斯和法塔赫作为巴勒斯坦内部14个政治派别中最为重要的两支力量,其权力平衡在哈马斯遭受重挫后被打破。哈马斯不仅在加沙地带被重创,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力量也被明显削弱。新一轮加沙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搜捕,共逮捕了约525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2000多人与哈马斯有关联。随着加沙冲突接近尾声,战后管理问题愈发紧迫,

[1] Sean Mathews, “How the US dived into a war to reshape Lebanon’s balance of power,” Middle East Eye, October 16, 2024,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how-us-dove-war-reshape-lebanons-balance-power>.

法塔赫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打击 Hamas 在约旦河西岸的武装人员，以进一步削弱 Hamas 的势力，同时向以色列、美国展示其具备管理战后加沙的能力。2024 年 12 月 5 日以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开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造成 6 名巴勒斯坦警察和 8 名武装分子死亡，死者多为 Hamas、杰哈德的成员。2025 年 1 月 19 日加沙停火后，Hamas 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影响力有所反弹，同法塔赫的矛盾可能激化。可见，巴勒斯坦内部的权力斗争正日益加剧。

（四）伊朗改革派的影响力上升

伊朗的地区影响力遭受打击后，其国内外政策面临重大抉择，国内社会和政治形势也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真主党受挫、阿萨德政权垮台暗自窃喜，他们本来就反对伊朗投入大量资源支持抵抗轴心，主张把工作重心转向国内事务。据以色列方面透露，在伊朗国内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其仍向叙利亚和真主党提供了高达 500 亿美元的援助。^[1] 因此，以现任总统佩泽西奇扬（Pejman Pakbaz）为首的改革派有望获更多支持，释放更大的经济和社会自由空间。2024 年 12 月 24 日，伊朗政府举行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投票决定解除对 WhatsApp 和 Google Play 等“热门海外平台”的访问限制。这是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项放宽社会限制、增加民众自由的措施，体现出改革派影响力的上升。

（五）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地位得以巩固，其国内权力平衡亦被打破，未来动向难以预测

2023 年以来，也门交战各方虽基本处于休战状态，但内战的阴影并未消散，权力平衡非常脆弱。九年内战的创伤深重，也门 3870 万人口中有 1820 万人亟需人道主义援助，450 万人流离失所。胡塞武装因不间断袭击以色列、间接支持巴勒斯坦，其在国内的合法性大大增强。2023 年 10 月 7

[1] Elliot Kaufman, “Benjamin Netanyahu: The Inside Story of Israel’s Victor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netanyahu-the-inside-story-of-israels-comeback-victory-middle-east-change-dad847d8>.

日以来，胡塞武装共培训了4.5万名战士，还计划招募更多儿童参加其夏令营活动。^[1]在也门南部，总统领导委员会（PLC）与南方过渡委员会（STC）是反胡塞武装的两大主要力量，但两者之间矛盾重重，沙特支持前者，而阿联酋则支持后者。如果以色列和美欧未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可能会进一步打破也门国内的权力平衡，导致内战再度爆发。

四、动荡的过渡期

新旧权力格局的转换往往伴随着动荡与冲突，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的权力失衡相互交织、交叉影响，使得中东地区的形势持续紧张。以色列、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等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不断激化，而以色列的军事冒险主义、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扩张主义、伊朗的战略选择及美国的偏袒政策，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

（一）膨胀的战略自信使以色列可能成为地区新的动荡源

迄今为止，以色列的进攻性军事冒险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对内巩固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对外打击了伊朗支持下的抵抗轴心。目前，以色列人对军事手段的信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内塔尼亚胡指出，若非1993年《奥斯陆协议》中的让步，就没有今天的巴勒斯坦问题；若非2000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就没有今天的真主党问题；若非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就没有今天的哈马斯问题。^[2]因此，以色列的自信心膨胀，其战略决策愈发大胆。在也门，如果以色列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全面打击，可能刺激胡塞武装再度袭击沙特、阿联酋，从而引发地区动荡，甚至可能

[1] Nadwa Al-Dawsari, "The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Houthis' Red Sea Attacks," Middle East Institute, January 22, 2024,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ideological-underpinnings-houthis-red-sea-attacks>.

[2] Jacob Magib, "Ministers back Netanyahu's demand for IDF to stay in Philadelphi Corridor in any deal," *The Times of Israel*, August 30,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ministers-back-netanyahus-demand-for-idf-to-stay-in-philadelphi-corridor-in-any-deal/>.

重燃也门内战。在叙利亚，以色列占领了两国之间的缓冲区，并在缓冲区之外建设安全区，深度干预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以色列北方司令部前司令阿米拉姆·莱文（Amiram Levin）曾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占领，最好的情况是可以长期占领；最坏的结果也可以将其作为交易的筹码。^[1]甚至，若叙利亚再次陷入内乱，以色列可能会向叙利亚的德鲁兹人^[2]（Druze）提供保护，并将其作为以色列与叙利亚反以力量之间的缓冲地带。在2011年至2018年叙利亚内战期间，以色列就曾向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反政府力量提供过现金、食品、燃料和医疗用品。在黎巴嫩，以色列保留了随时袭击真主党的权力，从2024年11月27日停火至12月22日期间，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了816次地面和空中袭击。^[3]

然而，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叙利亚和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不仅未能解决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反而会破坏其内部权力平衡，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动荡。或许以色列已经梦回1973年，当年战争结束时，以军向南推进至距埃及首都开罗仅100公里的地点，向北驻扎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郊区，从此阿拉伯国家再也没有能力对以色列发动战争，地区格局被彻底改写。这次，以色列也想构建一个能保证自身安全的“新秩序”。以色列前国防情报局局长亚德林（Amos Yadlin）直言不讳地表示，一年来哈马斯、伊朗和美国重塑中东秩序的努力都失败了，现在是时候塑造以色列版的地区新秩序了。^[4]

[1] Stephen Kalin, Anat Peled and Suha Ma'aye, "Israel's Expanded Perch on Syrian Border Puts Damascus in Its Sigh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israels-expanded-perch-on-syrian-border-puts-damascus-in-its-sights-bed2d218?mod=hp_lista_pos2.

[2] 德鲁兹人是一个具有独特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群体，主要居住在中东地区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他们在历史上形成了紧密的社区结构，保留了许多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3] Bby Sewell and Melanie Lidman, "The fragile Israel-Hezbollah truce is holding so far, despite violations," AP, January 4,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lebanon-hezbollah-israel-ceasefire-7d8e3ecced6305ef0ec922d04d571fb4>.

[4] Amos Yadlin and Avner Golov, "An Israeli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7,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israeli-order-middle-east>.

（二）近期内，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对抗升级不可避免

伊朗正面临自 1988 年两伊战争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其抵抗轴心被以色列重挫；国内经济形势因美国制裁而持续恶化，形势逼迫伊朗必须做出重大抉择。回顾过去的 45 年，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立足的两大秘诀在于：一是能在必要时刻默默承受挫折，吞下苦果；二是立足长远，于困境中灵活调整，以有限资源创造性地对强敌展开非对称性反击。^[1]今天，伊朗也可能做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其一，伊朗可能会对“代理人战争”“抵抗经济”和“反美反以”的意识形态进行修正甚至放弃，转而扩大经济自由度，同西方及周边国家改善关系，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然而，这样做无疑充满风险，这意味着伊朗政治的重大转型，甚至可能会引发国内的大规模动荡。更为现实的选择或许是，伊朗将重振旗鼓，重建抵抗轴心，强化“抵抗经济”，甚至公开发展核武器，从而进一步升高同以色列、美国的对抗强度。当然，伊朗也可能两边下注，一边试图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一边强化对抗美国的能力。目前，伊朗似乎暂时退出了中东的权力游戏，对叙利亚、黎巴嫩、加沙、也门等地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既不发声，也不行动。但是，伊朗的低调并不能换来和平与稳定。以色列国内正在讨论对伊朗本土实施新的军事打击，目标不仅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还要通过打击伊朗来削弱胡塞武装的力量。美国特朗普政府已决定再次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拜登离任前，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提交了一份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计划，明确指出如果伊朗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前决定发展核武器，军事打击将成为美国的选项之一。^[2]这些迹象表明，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风险在短期内依然居高不下。

[1] Suzanne Maloney, “The Middle East’s Dangerous New Norma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israel-iran-dangerous-new-normal-suzanne-maloney>.

[2] Barak Ravid, “Biden discussed plans to strike Iran nuclear sites if Tehran speeds toward bomb,” *Axios*, January 2, 2025, <https://www.axios.com/2025/01/02/iran-nuclear-weapon-biden-white-house>.

（三）土耳其政治伊斯兰扩张主义可能引起各方反弹，刺激外部势力再度介入叙利亚事务

过去十四年，叙利亚沦为极端组织的集散地，向全球输出了 650 万难民，欧盟为应对叙利亚危机已支付 330 亿欧元。^[1]2024 年 12 月 8 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占领大马士革后，美国、以色列和土耳其三国随即对叙利亚展开空袭。美国袭击“伊斯兰国”75 个目标，以色列对叙利亚军事目标发动了数百次打击，土耳其则打击了“叙利亚民主军”的运输车队。未来，若叙利亚新政府展现出明显的政治伊斯兰色彩，土耳其将以叙利亚为支点向中东、中亚和北非扩散政治伊斯兰主义。这一动向将引发美国、以色列、伊朗和沙特的高度警惕，可能导致叙利亚及地区形势重回 2012 年时的紧张状态。

2024 年加沙地区、黎以边境、叙利亚、也门都经历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冲突不仅破坏了旧有的权力格局，也为新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展望 2025 年，这将是中东新秩序的开局之年。然而，新秩序的形成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需要通过各方的博弈与较量来实现，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几个月，美国是否允许以色列重返消灭哈马斯的战争，是否支持以色列兼并约旦河西岸的部分领土，是否从叙利亚撤军，是否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是否默许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这些都会对地区局势及相关国家的内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预计 2025 年中东地区的局势将会持续紧张，直到基于新权力格局的新秩序最终确立。

【收稿日期：2025-01-08】

【修回日期：2025-02-19】

（责任编辑：邢嫣）

[1] Joseph C. Sternberg, “Europe’s Migration Cris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2,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assads-fall-wont-resolve-europes-migration-crisis-refugees-immigration-asylum-944cebaa?mod=opinion_feat3_columnists_pos1.